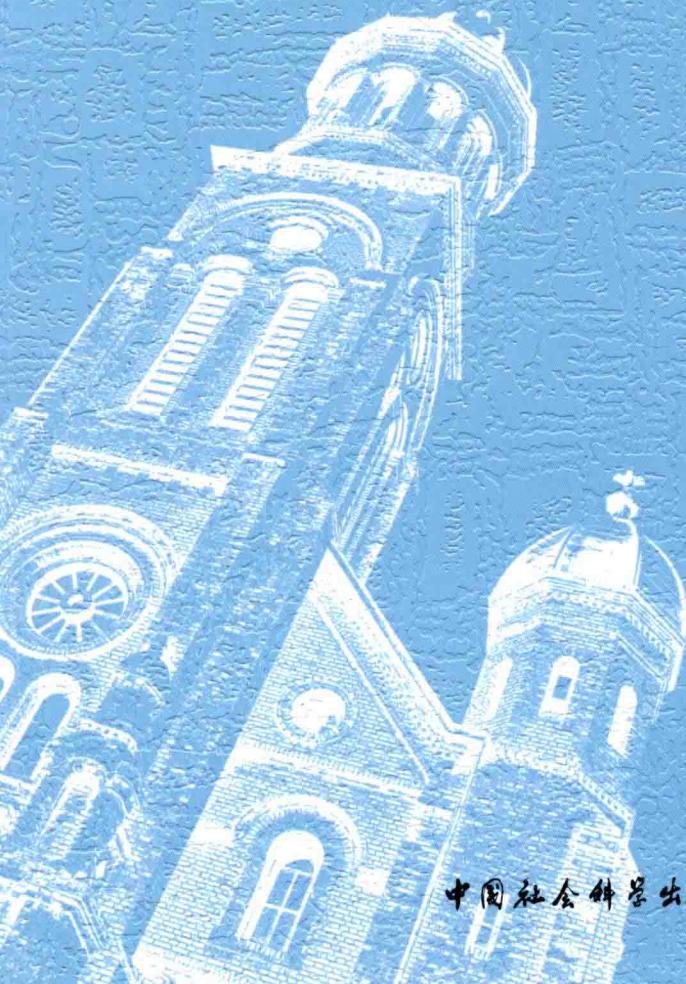


破碎的遗产：

现当代美国文学与信仰危机

袁先来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破碎的遗产：

现当代美国文学与信仰危机

袁先来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碎的遗产：现当代美国文学与信仰危机/袁先来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203 - 0312 - 5

I. ①破… II. ①袁… III. ①基督教—宗教文化—影响—文学研究—美
国—20世纪 IV. ①B979. 712 ②I712.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01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著作受以下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08JC75200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出版基金资助

特此致谢

目 录

绪言 基督教文化与 20 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的几个重要问题	1
第一章 1890—1920：宗教伦理与资本经济的裂变	23
第一节 导论	23
第二节 舍伍德·安德森：返回自然花园的工匠	37
第三节 德莱塞：镀金时代的以实玛利	54
第四节 《埃尔默·甘特立》：自我形塑的神棍.....	71
第二章 1920—1930：分析、迷惘与焦虑的时代	94
第一节 导论	94
第二节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思维模式的深层转化	103
第三节 “敢于绝望的勇气”：《老人与海》的 存在论神学阐释	112

第四节 时间的暴政：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历史视野	126
第三章 1930—1960：抨击与保守的神学叙事 146	
第一节 导论	146
第二节 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的使徒叙事.....	158
第三节 恐怖与战栗：奥康纳的启示之路	176
第四节 没有指针的钟：麦卡勒斯的神学观	189
第四章 1960—2000：本体论神学向宗教性伦理学的过渡 202	
第一节 导论	202
第二节 多克托罗《上帝之城》的反“神正论”叙事	212
第三节 上帝的性别：《秀拉》对上帝造人神话的改写	232
附录一 索尔·贝娄早期小说中的犹太人发展主题模式	
附录二 遗产是什么：菲利普·罗斯的犹太观	245
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83

绪言 基督教文化与 20 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的几个重要问题

基督教文化与 20 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的关系，涉及数量庞大的作家所信奉、作品所表达的信仰及其行为，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题目，这就必然要在绪言部分对阐述的角度做一番描绘和交代。北美传统新教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曾经提供了一整套关于世界的整体观念，企图用神学逻辑来阐释和演绎美国历史发展的经验。随着 19 世纪末昂扬的边疆开拓时代结束，随之而来的是 20 世纪种种冲击神学信仰的科学观念、哲学思潮、世界大战、经济困顿，甚至是亨利·门肯等人发起文化革命对新教文化传统的直接攻击，导致新教文化逐步丧失形而上学的论证能力，以及动员和引导信徒的功能，更遑论直接干涉社会事务的可能性。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无论个别作家如何看待宗教，宗教始终是多数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从摇篮到婚姻的殿堂，直到坟墓都伴随着大部分人。美国神学传统所确立的根深蒂固的道德目标、梦魇般的精神追求、对主义和正义的热情以及摆脱物质欲望导致的精神腐败，使得基督宗教在当代的世俗世界中，仍然发挥着道德伦理和政治正义方面的价值。20 世纪不同的美国作家对宗教的信仰有着不同的选择，接受并置身于其中、用其框架去解释世界，或者拒绝它、嘲讽它。

我们要避免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试图分析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信

仰体系，并将其作为作品核心性的、界定性的特征。现代学术允许选取特殊并且通常是有限的问题来进行研究，或采取比较和整合的视野进行研究。以下从新教价值观与信仰认同、政治认同的关系，新教伦理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关系，基督宗教与现代性因素的挑战，基督宗教与克里斯玛权威的平民人格四个方面阐释美国文学思想中所隐喻的基督宗教文化的重要因素。

一 盎格鲁—新教与美国的信仰认同、政治认同

不同历史时期进入美国的移民及其后裔，起初多少有着不同的宗教归属。这种移民因素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使得 20 世纪美国作家的族裔与宗派背景仍呈现复杂的局面。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像亨利·门肯、辛克莱·刘易斯以及范·韦克·布鲁克斯这样的作家或学者仍然将美国殖民地早期主导的宗教视为“清教”（Puritanism），如门肯在《作为一种文学力量的清教》中，讽刺清教饱含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而帕林顿在他的《美国思想史》里则认为，自由主义与清教的斗争是早期美国思想发展的主要方面，“美国整整用了 200 年的时间才瓦解了这些教义”。实际上正如笔者在拙著《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里所论述的，即便是推进到 17 世纪，北美较早和较大规模的欧洲移民都有着复杂的盎格鲁—新教背景，新英格兰、中部大西洋沿岸、南部沿海地区、阿巴拉契亚山的内地在初期大体上分别为公理派、贵格派、圣公会和源自苏格兰、爱尔兰的长老会所控制，更晚的荷兰移民则带来了归正宗传统，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德意志地区移民则带来了一些信义宗派别。宗教归属是不同种族特征的一部分，代表着某种特定的宗教传统，也代表着独特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带来盎格鲁—新教信仰与实践的移民，在殖民地环境下，很大程度上复制了 16—18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与分裂所形成的各种特殊形式。然而随着所处社会情境的大不相同，欧洲移民所带来的新教派别很快进一步分化成种类



繁多的改革派团体，很难说有一个所谓统一的“清教”观念。在 18 世纪大觉醒运动、独立战争之后，一些新兴的、更本土化的宗教复兴派，如浸礼会与卫斯理教派的影响，明显超过传统长老会、公理派，这些新兴派别要抛弃过去数个世纪教会累积的教导——在他们看来，过去的教会政治与社会史就是压迫的历史，声称遵守“原始的、新约式的”教义。在这样广泛的宗教变革、裂变的背景下，许多神职人员和世俗的理想主义者开始为各教派之间的转换进行激烈的竞争。在 19 世纪上半叶，公理会、长老会与发展迅猛的浸礼会、卫斯理教派许多神职人员在一些地区最终形成了基督教联合阵线，共同提倡政治改革，基于一种“可以判断所有人类行为的客观标准”，为“民主”——那时候称为“共和主义”而斗争。

一开始的种族混合，就使得北美移民及其后裔基于特定宗教传统的种族特征容易被消解，以形成更大的跨种族团体——美利坚种族群体。随着美国宗教生活中源于欧洲的新教派别的重要性下降，在现代美国语境中，鲜明的宗教实践、教义的特性和要求明显趋弱。美国人一直处于可轻易改变自己宗教派别和归属的状况，如海明威出生在一个公理会教徒的家庭，第一任妻子是圣公会教徒，可能受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即情人保莉娜的影响改信了天主教，最后按照简单的天主教仪式安葬，也许如库尔特·辛格在《海明威传》中所说的：“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履行义务的天主教徒，而是一个泛神论者和折中主义者。”新移民也没必要在一些细节上去适应现有宗教团体的正式教义和实践，有利于他们快速地融入美国社会。尤其是像浸礼会与卫斯理教这样土生土长的新教派，没有欧洲长老派、公理会派那样具有明显的种族特征，超越了狭隘的种族界限，容易吸纳形形色色的移民及其后裔。如果说“政治认同”常被用来隐晦地表达移民群体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信仰认同”则反映了移民群体在美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人倾向于将自己主流的移民身份确定为“正宗”的 WASP，即 White（白种人），Anglo – Saxon

descendant（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后裔），Protestant（基督新教教徒）。WASP 的确有着相似的移民基因：不断扩大定居和迁徙范围的行为，为他们提供一种自由、独立和光荣感，提供内心深处强烈渴望的东西，即荣耀和自尊，摆脱依附性的、受压迫的、难以忍受的生活，却对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曾经的掠夺与殖民历史漫不经心——在 19 世纪大西洋两岸，西方文明世界中的人们打着自己被号召去创造历史的旗号，进行野蛮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行动的实践。而美国人用“天定命运”来证实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以具有欺骗性的利他主义概念来证明自己思想的合理性。历经三个世纪（约 1620—1890 年）的迁徙殖民、独立战争、边疆开拓，美国完成地理边疆的推进，逐渐摆脱欧洲影响，实现了美国人自我的确立。20 世纪的美国作家，在“荣耀、光荣、勇敢或神圣等字眼变得可憎”之后，成为空间和精神的迁徙者，努力摆脱狭隘的、目光短浅的心态，无聊的家庭纷争，令人窒息的爱国主义，传统宗教和道德的腐朽之气，这使得具有象征意义的各种形式的“跑”或者“逃离”主题长盛不衰，也使得一条不间断的宗教精神主题始终得以延续和复兴。

WASP 出身的主流作家，在一些作品中会透露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对他们来说，现代性的缺失会使得他们反思和眷念传统神学信念，重新估量其伦理价值。如“镀金时代”结束后的舍伍德·安德森，他的许多长篇小说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憎恶，但他的出发点是否定美国文化本身。如果说《小城畸人》探究了文化断层时期“美国意识”中的软弱、胆怯与缺乏自信的话，《暗笑》则是挣脱这种意识困扰的一种思考，即从新教狂热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工商业世界算计中解脱出来。小说反复呈现的《旧约》意象，是布鲁斯“喜欢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传宗接代，羊群土地，播种饥饿，经年累月，日复一日。他喜欢约瑟夫、大卫、扫罗和力士参孙”，其实是从《圣经》子民式的强烈幻想出发，重振美国先民的男性繁衍力量。在经济大萧条与农



业完成工商业化的时期，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也深刻反思了金融资本驱动的经济体系的罪恶，但是也充分利用了《圣经》叙事，将自己的作品扮演成美国文化中使徒行传的角色，向民众宣告：冷漠无情的“私有制”占有，使得美国的扩张精神以及依附其上的荣耀和自尊消耗殆尽，进而威胁到美国社会稳定和价值信念。小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乔德这样的家庭难以确定的生存，而是对美国现有价值观念的重新理解以及长远发展的新承诺。辛克莱·刘易斯的牧师小说《埃尔默·甘特立》表面上攻击的是基督教传统，但实质是揭露美国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危害，实业化、实用主义化的宗教形态所导致的信仰沦落，以及宗教界堕落与伪善的现象，并对美国既有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中虚假部分做了深刻的披露与反思，最后又认可了基督宗教“神秘的崇拜需要”，“不可知的向善力量”对美国人格塑造的价值。对于 20 世纪的美国人来说，在理性、匀称、节制的生活系统中，仍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战争、暴力、强权和生活的卑微、琐碎，以及精神委顿。出于克服人类盲目自信与自身弱点的目的，美国人多少仍将变革了的基督宗教伦理视为调节“文明”社会野蛮行为的杠杆。

移民身份种族特征的消解，也是美国文化强大同化力量强制性作用的结果，亦即任何外来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进入美国社会时，它们就得接受改造，而且通常在非常基本的种族、民族属性方面，否则就很容易受到或至少感到压迫、排斥和边缘化。盎格鲁一新教的主流语境和色调，使得美国独立革命以后进入美国的天主教、犹太教、亚裔等族群的人必须对置身其中的文化道路做出艰难选择。尽管最初维持种族信仰的冲动非常的强烈，甚至有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犹太教移民，在自己神职人员的关键性引导下，还一度保持了各自版本的信仰、旧的宗教制度很长时间，但在经历两种文化、两种信仰、两种身份的纠葛与痛苦之后，最终或多或少地淡化了自身的原有身份属性而归化到新的语境

之中。以本书涉及的非 WASP 作家为例，德莱塞曾说自己是个以实玛利，因为他的祖先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的父亲是个极端拘谨的天主教徒，母亲是孟诺派新教徒，他早年的作品里对美国新教伦理信条漠然视之，但在最后一部作品《堡垒》里，选择了相当虔信的教友派信徒巴恩斯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确信资本主义体系的“正确”，多少意味着德莱塞缓慢地回归到美国新教文学传统中怜悯与自疚、迷惘与恐惧、客观性与责任感的矛盾中。奥康纳是生活在“圣经地带”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始终对新教徒预言家们那种强烈的情感和神秘的灵性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多少接受了加尔文新教“预定论”，将其视为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心、力量、喜悦和奥秘之源。一般来说，来自西欧的移民，有新教背景的话同化程度要高很多，而天主教徒往往也会或主动或被动地调和其自身传统，转化为较自由类型的基督宗教。

不仅是天主教徒，犹太人也是如此，经较自由开放、主张同化的派别改造的犹太教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占据上风。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较为“正统”的派别力量大增，就像菲利普·罗斯在《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里所说的，将纽约、迈阿密和洛杉矶这样的地区作为犹太社团聚集的中心，为自己的社团提供明确的参照标记和安全感，他们“跟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连讲笑话都是犹太人的笑话”。这反映出美国移民信仰归属的复杂、多变、互动的特征，并非固定不变或单向发展。与天主教、新教神学的情况一样，美国犹太教的神学相对来说，很少得到发展。摩迪凯·开普兰曾说，“美国的犹太人首先要成为美国人，当犹太人是第二位的”，犹太人不得不在文化夹缝中一直努力与美国社会建立满意的联系，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求，犹太教的美国化或世俗化才是美国犹太人的出路。在第三代犹太裔菲利普·罗斯看来，也许清除不合时宜的礼仪，消除文化孤立主义，弥合犹太教与基督教、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距，最终塑造出在思想文



化方面足以适应美国社会的“新型犹太人”，才能避免犹太人的孤独、游离、被排斥的感觉。而来自俄罗斯犹太裔的多克托罗，在千禧年创作了小说《上帝之城》：生锈的圣公会教堂的十字架被莫名其妙地送到进化犹太教会堂，促使圣公会的牧师佩姆伯顿认识到，上帝“就像文明一样，是在不断进化的”，“犹太教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最终佩姆伯顿爱上了犹太女学者莎拉·布鲁门撒尔，并且和她一起在传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废墟中寻找继续信奉上帝或者重新定义上帝的理由。随着不同教会在美国组建、扩展，并持续接纳世界不同地区的教徒，各民族、种族教会的特性被逐渐冲淡，使得宏观意义上的宗教派别实际包含了诸多民族、种族的宗教传统，但又包含了对美利坚的信仰认同与政治认同。

二 美国新教伦理与商业资本主义

除了在政治、信仰上的认同之外，盎格鲁—新教还在美国的经济领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在 1904—1905 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通过对其所认为的与近代世界起源有独特关系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考察，提出宗教改革运动在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方面有着特殊作用。自殖民地时期以来，以日记、布道、自传和史诗为体裁的美国文学的确能够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新教伦理为美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秩序结构，他们在所谓神意的支持下开始追求物质财富的进程，以及对印第安人、对墨西哥与对海外的暴力征服。然而，我们必须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第一个方面，从宗教的本质而言，禁欲主义特质应该更多的是约束而不是激励商业经济行为，寻求精神救赎的追求必然与有目的、系统的经济行为相冲突。^① 追求财富的价值取向必然同时刺激个人的私利意识，反过来

^① 《马太福音》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难免危害理想社会道德的整体性和完美性，浪漫主义时期的柯勒律治就讽刺过贵格派教徒的拜金主义热望，“在我想象的视野之中，这些卓越的、为世人所敬重的基督教拜金主义者就像一群负重的、全速前进的骆驼，个个都满怀信心地希望带着牲畜和货物一起畅通无阻地穿过针眼”^①。

然而又必须注意第二个方面，新教伦理和商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循环，又的确是马克斯·韦伯于 1905 年在美国旅行期间所观察到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可能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在文化中宗教是象征性的，在文明中宗教却成了实用性的”^②。以威拉·凯瑟的《大主教之死》为例，该作品回顾了早期的教徒在遥远而陌生的新世界为弘扬宗教而遭受的苦难，“他吃的是牛肉干和辣椒菜豆泥，能有水喝就该谢天谢地了……他的青春和精力像雨水一样吸得一干二净，他要准备做出各种牺牲，包括自己的生命”。然而主教在将蛮荒之地建成乐园之后，转而关注个人得失和世俗的功利，实际上正是影射美国中产阶级自我实现的精神实质。南北内战之后的镀金时代，是美国快速进步和西部边疆继续扩张的时期，最为流行的大众读物千篇一律地描写贫穷但聪明、勤奋的青年发迹的故事，整个国家在发财—致富—享乐的魔笛伴奏下翩翩起舞。大西洋两岸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解决了许多折磨人类的问题，而物质世界似乎也顺从人类的愿望和企图，臣服于人类的支配之下，却不曾料到很快被物化的力量所支配。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边疆时代的结束和工业化的完成，城市工商业消费意识形态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趋于主导。1900 年所创作的“嘉莉妹妹”形象成了美国文学中第一个自甘堕落的女性，与《珍妮姑娘》一道，将美国城市中的奥革阿斯王牛圈里的

①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ay Sermons*, Ed. R. J. Whi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p. 191.

② [俄] 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学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8 页。



污秽无情地抖搂出来，或者说第一次揭开了新教道德伦理与商品经济的物欲享受之间的虚伪面纱。年轻激进的门肯和凡·威克·布鲁克斯，勇猛地抨击新世界的掠夺性和纸醉金迷，揭露精神生活的穷困贫瘠，“缺乏灵魂的物质主义和整齐划一，他们眼中的美国表面上遵循个人自由和基督教伦理，实际上却追逐市场的达尔文主义价值观”。贝尔说抑制平衡的“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耗尽了能量，韦伯说受理性主义扶助的资本主义，将教义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胜利最终会抛弃宗教，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商品经济的物欲横流本身，必然导致传统新教伦理价值在人们当代生活中的衰落。

辛克莱·刘易斯在《埃尔默·甘特立》里还揭示了一个现象，即金钱成了商业社会成功、权势与荣耀的手段和宗旨，教民的数量、宣教的力度和社会影响力要像商业标准化、数量化一样可以衡量，这就是莎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没有高贵的出身，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福音传道事业的秘密。埃尔默意识到这个商业化社会需要的宗教是振兴实业的宗教，轰轰烈烈的福音布道事业背后的真相，是民众在神学指引下对发财的渴望。莎龙为埃尔默量身定做了一场报告，说他是一位机械工业界的巨头，他将演说“用上帝和《圣经》的力量来增加生意”，并且这还将会成为“一个振兴实业的新世界的启示录”。吐米斯主教甚至称赞埃尔默的观念，宣称“真正虔诚的祈祷和入静深思可以在身体健康和金钱福利上产生物质的效应”。传统新教伦理规定了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然而作为 20 世纪的社会事实，其仅仅成为苍白无力的意识形态蹒跚拖延，“与其说它是现实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道德家用来劝世喻人，或是社会学家用来编织神话的材料”^①。辛克莱·刘易斯笔下的乔治·巴比特发现，一辈子凭着虔信上帝和金钱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02 页。

发财致富，却又精神空虚而怪梦不断。更为恐怖的是，他们害怕这个社会的操控力量，这个守旧的社会会奖赏遵循它的伦理原则的人——通过提供工作机会、俱乐部的位置甚至一些奖赏给予他们生存的安全感和地位，并威胁和惩罚那些企图反抗的人——比如从“好伙伴一族”中剔除出去，作品中写道：“他的独立不羁精神，早已烟消云散了。他独自一人在街头徘徊，害怕人们投来的讥讽的目光和没完没了的窃窃私语声。”

这意味着第三个方面，即所谓新教伦理，一度沦落为维护社区稳定和商业繁荣的虚假规范。韦伯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并没有在意美国宗教界如何处理信仰和商业利益的关系，这恰是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着笔之处。美国的工商业中产阶级陷入一种舒适的工作、礼拜、家庭生活轨道，任何可能威胁现状的新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惧和抵制。民主一旦变成了民众循规蹈矩的喜好，社会的良知就降低了它的趣味和智力。几乎没有反思能力的巴比特是一切保守的、传统的事物的维护者，表面上坚持一种叫作“伦理道德”的东西，捍卫福音派新教会，保护幸福的家庭和繁荣的商业。他的实用主义宗教观的核心是“上教堂做礼拜，为的是让人们瞧得起自己，对生意有好处：教堂能防止坏人变得更加十恶不赦”，防止人们做“空头”的地产生意。他服膺于为了资本利润和生活方式所塑造出来的集体性的虚假意识，臣服于一种强制控制性的、潜移默化的、集体主动的价值体系。20世纪20年代老派而又守旧的保守势力，在信仰与教义方面已不再那么严格，却偏要坚持一种根深蒂固的原教旨主义倾向。他们强行实施“禁酒法案”，整肃道德风尚，一时原教旨主义猖獗，极端宗教活动频繁。原教旨运动反对世俗化、自由神学、宗教多元论、社会福音论以及任何具有改革倾向的思想意识，渴望保持禁欲、“节制”的品格——这本是美国新教文化传统道德的核心部分。然而这一生活方式逐渐失去了优势的地位，进而激发害怕变革



的保守人士对新生活方式的拒斥，发起对“体面”传统价值观品格的维护，甚至不惜动用法律的形式或极端行动。

对于美国而言，新教伦理和商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像奇妙的莫比乌斯环一样，在弯曲、拉大、缩小或任意的变形下保持同样的转换。丹尼尔·贝尔曾将两者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前者作为“自我约束、节制和满足的延缓”的性格品德，“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两者相互制约造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讲求实际、满足物质进步的宗教，富有效率、可以计算成败得失的宗教，力图改革、改善道德服务于现实而不是玄学逻辑的宗教，他们对牧师不断地诉说人的罪恶不幸，以及有关人的傲慢自大、贪得无厌的罪恶的警告几乎是漫不经心的，他们在新教伦理观念的支持下推进文明的进程。

三 美国基督教所面临的现代性挑战因素

除了商业资本主义对美国新教产生重大影响之外，20 世纪还有相当多的现代性因素影响了作家对包括新教在内的基督宗教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启蒙与现代性对基督宗教的主要影响，显然在于剥夺了后者政治合法性、仪式神秘性和干预生活的能力。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思想来说，现代性实际上也是对历史文化严重危机的一种思想反映，而这些危机反过来又有利于基督宗教的发展，如存在主义神学、女性主义神学、政治神学、解放神学与梵二会议以后的天主教革新运动的产生。然而这一系列的神学自身发展没有在美国产生太大的影响，原因在于，20 世纪许多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和变化，与美国之间隔着大西洋这样一个很宽阔的缓冲区域：虽然美国科技最为进步，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但是这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胜利感和欢欣感，与处于战后废墟的欧洲情绪截然不同，此外殖民主义崩溃的冲击，对美国